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陈平原 主编

大学的意义

蔡元培

叶隽 考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卷

大学蔡元培

的意义

卷

◎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陈平原 主编
◎ 蔡元培卷 大学的意义 叶隽 考释

山东文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元培: 大学的意义 / 叶隽考释.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7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 陈平原主编)

ISBN 7-5329-2600-1

I. 蔡… II. 叶… III. 蔡元培 (1867~1940) — 演说—选集 IV. 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679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965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 6.875 插页 / 1 千字 / 151
定 价	17.00 元

总序

陈平原

按使用的功能，晚清以降的“演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二是文化传播与学术普及。前一类声名显赫，后一类影响深远；与学界同行的思路不太一样，我更关注后一种演说，因其与现代中国学术及文章的变革生命攸关。至于与“演说”三足鼎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报章书局的大量涌现，使得学者们很少只是“笔耕不辍”，其“口说”多少都在媒体或文集中留下了痕迹。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演说”，成了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生活与学问的最佳途径。于是，我决定选择章太炎、梁启超等数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演说”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与表达。演讲者“说什么”固然重要，可我更关注其“怎样说”——包括演说的姿态、现场的氛围、听众的反应、传播的途径，还有日后的“无尽遐思”等。换句话说，我希望兼及“演说”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关系密切，这点我很早就意识到，只是一直犹豫不决，到底

该从新式学堂的演讲课程入手，还是专注于某些著名学者的学问人生，抑或着重考察其与文体变迁的关系。1999年春，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我构思了《“雄辩会”与“讲演团”——兼及“五四”青年的文化姿态与思维方式》一文，可惜半途而废，只留下“五彩缤纷”的论文提要和一地散钱。而从谈论章太炎避难东京时如何将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欲望，在“讲学”中借助各种穿插，表达得淋漓尽致^①，到描述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怎样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②；再到辨析鲁迅和胡适各自的述学文体与演讲活动的关系^③，以及综合考察性质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代中国文章变革》^④，我主要探讨的是：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一是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

① 参见《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载《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第1—52页；此文修改后，成为拙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四章。

② 参见《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此文摘要刊2002年5月31日《文汇报书周报》，全文刊《现代中国》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并收入拙著《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③ 参见《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胡适的述学文体》，《学术月刊》2002年第7、8期。

④ 本文曾于2005年4月28日在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2006年1月2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举行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有几点必须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①;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章太炎等人的讲学,与宋明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基本上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第五,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绝对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演说”;学者之公开讲演并刊行讲稿,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第六,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②;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

以上简要的叙述,大致涵盖我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及文章变革所做的探索。区区论说,不如意处仍多多。恰好,我的

①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②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几位学生对此话题也有浓厚的兴趣，于是组织他们，选择各自熟悉且欣赏的对象，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之所以选择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陶行知（1891-1946）、朱自清（1898-1948）、闻一多（1899-1946）等八位作为考察对象，首先基于其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或文化名人，或学界领袖，此八人全都身负重任，一言九鼎。“演说”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演说者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声誉有很高的要求。同样一句话，不同身份的人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听众之所以动不动“大拍掌”，很大程度基于对演说者的崇敬以及“前理解”。除了个人魅力，论题的选择，同样十分重要。上述诸君演说的重点，在思想文化，而不是政治动员。如蔡元培之谈论大学意义，章太炎之主张以史救弊，还有陶行知之演讲生活教育之路以及朱自清的解说诗文意蕴等，时至今日，仍有其独特魅力。

其次，还得考虑演说者的口头表达能力。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一场主宾皆大欢喜的讲演，抽离特定时空，很可能不知所云。相反，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大听众。讲演者的姿态以及讲演时的技巧，同样影响到演说的成败。不同于专业著述的条分缕析，讲演必须突出大思路，而且讲求幽默，语出惊人，这样，才能让现场的听众不断地“拍掌”、“大拍掌”。而这，并非自然而然达成的，很可能是现代学校训练的结果。闻一多在清华、朱自清在北大、陶行知在金陵大学，都曾受过专门的演说训练。当然，最著名的还属胡适的故事——1912年夏天，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修“一门极有趣的课程”，那就是训练演讲，此后，“这一兴趣对我

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①。并非每个人都像胡适那样，对演说保持持之以恆的兴趣。比如，闻一多就曾对清华的演说课程提出过批评，可最后时刻挥洒自如的绝佳表现，其实得益于其早年训练。至于鲁迅称“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②，那是作者过谦之词；据许多听众回忆，鲁迅演说时思路之奇崛、语言之幽默，让人叹为观止。能演说，有深度，论题重要，且讲稿保留下来，这样“四美兼具”的大好事，并非俯拾皆是。

再次，“演说”与“文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问须冷静，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所有这些，决定了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的撰述，虽有“大体”，却无“定体”，往往随局势、论题、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但另一方面，演说与演说者的人格、趣味以及文章体式，又是密切相关的。闻一多与朱自清性格不同，在演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春风化雨，一雷霆万钧；西南联大师生回忆这两人的讲课、演说以及生活逸事时，三者之间往往能够互相印证。至于胡适与鲁迅，演说一如其文章，或文化立场坚定，高等常识丰富，清朗而畅达；或自我质疑，迂回前进，千里走单骑。当然，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演说与文章，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最后，该说到本丛书的最大愿望，那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演说现场”。严格说来，所有的演讲记录稿，都很难准确传达演说者的真实意图。章太炎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而弟子沈延国更是将传世的章氏讲演记录分为五类，称只有那些师“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者，方能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用^③。至于鲁迅，更是清醒地意

①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58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第392—39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识到此中陷阱。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①，或因与相关文章重复^②。若只是孤零零的文本，那些偶然留传下来的“演说”，自然是不尽如人意。因为，专著能够深入，教科书讲究条理，文章可以反复琢磨，演讲则追求现场效果。单纯的演说，确实不及专著或文章精深；但如果添上相关史料的考辨，使“演说现场”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原，那意义可就非同一般了。

单是阅读记录稿，你很可能觉得，绝大多数演说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本丛书的操作，与一般意义上的“考辨”略有不同，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众、论题，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只能留待读者评判了。

2006年4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① 在《〈集外集〉序言》中，鲁迅称：“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

② 参见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行政官与演说家

——《蔡元培：大学的意义》导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蔡元培离沪去港，虽身不在战火之中，仍十分关心国事，忧念不已，曾有诗云：“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①诗虽粗糙，然则纸背之意，跃然而出；爱国之心，不后少年。然而，此时的蔡元培，毕竟已



1912年3月30日，在南京临时政府总部合影。第一排左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三排左二为教育总长蔡元培。

是七旬左右的老人了，虽是“有心杀贼”，终究“无力回天”，更兼经济困窘，营养不全，身体日渐衰弱，终于在1940年病逝于香港。全国民众无不对蔡氏之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毛泽东亲书挽联：“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谓的论。国民政

^① 周天度：《蔡元培传》第3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府亦布褒奖令，称其“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赞其“高年硕学，永为党国仪型”^①。

其实，正如褒扬令中点明的，蔡元培虽也曾任国府委员、监察院长、司法部长等高官，但真正使其名垂青史、永垂不朽的乃是他曾担任的教育行政职务，诸如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大学院长、中研院长等。以上这些职务，非常明确地将“人文学者”出身的蔡元培纳入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去，那就是兼有“教育首长”与“人文学者”的双重身份。行政长官重的是行动高效、整齐划一，人文学者讲究的是社会关怀、独立思考，这两者又如何能够相融为一体呢？学者当官，难免为人所讥，会堕入“依附权贵”的陷阱；官兼学者，同样会被人看不起，以为不过是“以权谋私”，弄个“学问家”的冠冕。然而，在蔡元培身上，竟真的能将这两种似“水火不相容”的身份“妙手天成”般地融于一身，这样的本领，真的不能不细细探究。

一、教育首长与人文学者双重视野中的“现代大学”

在蔡元培，虽然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既有过由“前清翰林”一变为“留德新生”的过程，也有过为“革命首脑”任“政府高官”的资历。但要而言之，其活动的中心范围，仍在“教育圈”内。且不说其出任教育总长、大学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行政要职，也不说他弃官禄做校长的果敢选择，就是出任北大校长的那一段经历，也足以使他“彪炳千古”了。

确实，大学经验与成就，正是蔡元培这一生中最足以夸耀的“政绩”。虽然，蔡氏从不以官僚自居，但若论其一生成就

^① 《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重庆。

的取得，没有“行政官”的身份垫底，恐怕真的不太容易做到。然而若是只有这为官的身份，蔡元培也决不是蔡元培，君不见，历朝历代，谁没有自己的教育行政官？可又有谁，能做到蔡元培这样的事功？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蔡元培的身份，本质仍乃“人文学者”。正是因为有着“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与独到理念，才有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现代大学观”。

以五四时代北大学生之傲气，居然对蔡校长推崇得五体投地。你不能不佩服这位蔡校长的人格力量，所谓“蔡（元培）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①这样的境界，遍数历史，又有几人可以达到？

蔡元培的接近“现代大学”，甚至“入长北大”，是建立在他博学游历、关怀深重的基础之上的。早年敢于弃官回乡，原是已立定从教育着手、改造中国的决心。从办学而转向革命，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在中国彼时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由得他们这些思想进步者来进行教育改革，甚至连身家性命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兴光复会、入同盟会，其目的是先革命、获政权，然后再从容考虑国家的建设与教育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作为辛亥元勋的蔡元培，才会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教育问题。更何况，需要加入的一个因素，是他在留德期间，潜移默化地深受德国大学制度尤其是洪堡思想的影响^②，确立了现代化的“教

①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载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27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②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叶隽《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与蔡元培留学德国》，载《德国研究》2003年第4期。

育理念”。

以是观之，不管是1911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还是1916年的出长北大，都必然是成竹在胸，韬略兼备。且不论蔡氏为教育行政长官时是如何在宏观上为国家设立教育发展的“宏大框架”与“百年大计”，就看当这一代元勋与学术领袖落实到某所具体大学时，是如何立定根基与处理琐务的。当初其就任北大校长之初，思路就相当明确，“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为吾人共同之责任”^①。当时国内友人颇多不赞成他出任北大校长，认为北大腐败，不必去趟此浑水。但蔡元培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他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②后来还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③以表明自己之决心。蔡氏在北大的改革，确实也实践了他自己的理想，虽然困难重重，但却以其个体的人格魅力与气魄，一举而奠定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之基础。所谓“他（指蔡元培）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如程颐……说程颐‘纯粹如真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④

①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474页，转引自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致吴敬恒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0页，转引自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38页。

③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1页，转引自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38页。

④ 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载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359-3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人们称道蔡元培在北大改革的成功，多将其归因于蔡氏的人格力量与道德修养，诚然如此，但另一方面的因素却也不容忽视。那就是蔡氏“教育首长”与“人文学者”的双重身份。既为教育首长，就必然有宏通的文化与教育视角，他进行思考与处理问题，就会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而且在应对复杂的行政事务方面，也有相对丰富的经验，这一切对于做好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北大这样的中国第一大学来说，更是如此；而其本质是人文学者，这就决定了蔡氏对大学、对教师、对学生，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少了几多“官僚之习气”。学者之任行政职务者，往往难免于“迂腐”之讥；官僚而任教育行政者，同样难免“外行”之讽。难得的是蔡元培集二者之优势于一身，而又去二者之恶性一面，难怪蔡氏之长校北大，各界都能深庆得人了。

同样，正是因了与大学“剪不断、理还乱”的过多牵连，蔡元培自身也有极为浓重的“大学情结”。但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还与一般人眼中的大学不一样，因为，在蔡氏而言，既有曾为教育行政首长的经历，就必然会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审视大学，有其通达的官场态度；而从本质上来说，蔡氏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学者，所以其对学术的浓厚兴趣，也必将制约着他对大学的判断与思考。当然，这两者的结合，正是处于官僚与学者之间的大学校长，而这样的校长位置又恰恰是曾为“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难怪，蔡氏履新之初，即以“整理故都之学府”而自勉。至于其背后思路，则在致汪精卫信中有明确提及：“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外国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主义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

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①

在蔡元培心目中，教育确实是振兴国本之不易良方，而大学教育，则更为涉及根本。蔡氏关于现代大学构建之思路，在其新官上任时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有所表现，但又不仅于此。概括说来，大致有以下数端，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条是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路。以胸怀开阔、海纳百川的思路来办学，具有真正的教育家的气度和风范。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思想，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之形成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条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抱定求学之宗旨，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②入大学的功用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强调实用价值。在他看来：“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上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③这种共同研究学术，显然指的既是老师与学生之共同研究，也指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共同研究，大学不是一种简单的课堂的继续，而是一个追求高深学理、共同探讨研究学术的地方。

第三条是强调“立人”的思想，重视中国古代“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他在1925年7月25日世界教育联

① 《致汪精卫君书》，《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下册291页，新潮社编，转引自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39页。

②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第4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③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转引自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50页。

合会第二次大会上发言时，即将此点归结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第一个优点^①。他本人即可谓传统修养的典范，“谈到蔡先生的道德、学问和对于国家的贡献，凡是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发生由衷的景仰，永久的怀念，了解他最深切的吴稚晖先生，称许他为‘周公型之人物’、‘通人而兼学人’，这种高度推崇的话，出之于生平不屑对人作阿谀语的吴先生之口，格外显出蔡先生的伟大。”^②蔡元培不仅“以做到独善其身为己足，而且更要做到兼济天下的境界。所以他除了自立以外，还要立人”，故此“他常常勉励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③。因为是要“立人”，那么发展人的个性自然是教育的应有主题，对此蔡元培直言不讳：“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④强调教育之中注重对个体的个性重视，目的则是“立人”，是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能和谐共生。

第四条是处理学术与国家的关系。蔡元培以德国为例说明学术与国家强盛的关系：“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是力抗群

① 欧阳哲生《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载丁石孙等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第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孙德中《一位大教育家》，见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第398页。

③ 李济口述，陈德仁记《融会中西学术的大师——李济博士谈蔡元培的学术贡献》，见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第411页。

④ 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第316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另参见张翼星、陈岸瑛《繁荣学术、培育人才的远大方略——蔡元培教育思想刍议》，载丁石孙等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第24页。

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①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学术之重要，其兴趣偏于高等教育^②的原因，临终遗言也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③”。至于强调大学之自由独立，更是不遗余力，他的基本思路就是：“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④这里的自由更有兼容并包之意，涵盖了洪堡所担忧的大学门户之见、僵化封闭之弊。至于强调大学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更是蔡元培“教育独立”理想观念的核心部分，他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⑤，其理由则是教育求远效，政党谋近利，二者步调如何可能一致？在实践之中，蔡元培更是言行一致，以全力与政府争大学独立之权利，其公开言论则为“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联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联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⑥。

重视传统的意义，但实质却是由西方（具体说是德国）引来现代大学制度，并使其在封建传统浓厚的北大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仅是因为“天时地利”，更在于“人和”的重要。没有蔡元培这样集学养人格治事能力于一身的学术领袖，也同样不可能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良好开端。

① 《怎样才配作一个现代学生》（1930），《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79页。

②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7），《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197页。

③ 陈立夫《悼子民先生》，见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第397页。

④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71页。

⑤ 《教育独立议》，《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77页。

⑥ 《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26-329页。